

# 变异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研究<sup>\*</sup>

## ——兼谈与修辞学风格研究的互鉴

田海龙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49)

**提 要** 随着变异社会语言学从第一次浪潮发展到第三次浪潮,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认为风格由说者投入注意力的程度直接导致,到风格是说者为听众所设计,再到风格是建构身份表达立场的社会实践。本文重点讨论第三次浪潮中的风格实践研究,通过讨论风格模仿、越界、风格化、拼凑等风格产生的方式认识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产生的观点,通过讨论指向性、指向秩序、立场、意识形态等工具性概念认识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实践的理论阐释。基于此,文章进一步讨论变异社会语言学与修辞学在风格研究上的相互借鉴:变异社会语言学在认识风格的整体体现形式方面可以借鉴修辞学的研究成果,修辞学也可以在探究风格的建构性方面借鉴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风格 风格实践 变异社会语言学 修辞学 互鉴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22.04.010

### 一、引 言

“风格”(style)是一个非常宽泛和模糊的概念,其所体现的内容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座建筑会有风格,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会有风格,穿衣打扮也有风格。可以说这些“社会风格”(Machin & van Leeuwen 2005)无处不在,正如卡博兰德(Coupland 2007: 1)所说:“世界充斥着社会风格。”但是,风格之所以是风格,主要是因为风格具有社会意义,既能体现或建构言说者的身份,又能表达或代表言说者的立场,因而风格也最明显地存在于语言使用之中,成为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社会语言学家对“风格”及其体现和建构身份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和更新。因此,寻求一个关于“风格”的简单定义已经成为一种奢望。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不断地发现语言运用中“风格”所体现的社会意义,以及如何阐释言说者通过特定的语言变体来形成风格,进而建构身份,表达立场。

<sup>\*</sup> 本文在 2021 年 12 月 4-5 日复旦大学举办的“纪念《修辞学发凡》问世 90 周年暨第十二届‘望道修辞学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研究风格所体现的社会意义是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的传统,本文对此展开讨论,包括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路径的演变及其对风格的不同认识,以及对风格产生的方式和对风格实践过程的理论阐释,其中会涉及变异社会语言学提出的一些风格研究的新概念和新视角,借此说明风格研究在社会语言学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结合修辞学关于风格研究的论述,就修辞学和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研究的借鉴和融合进行初步讨论。

## 二、风格研究的三个阶段

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Eckert 2012)。尽管“浪潮”(wave)这个隐喻体现出后浪超过前浪的意义,但是这三次浪潮的关系在艾克特(Eckert 2018: xi)看来更应该是每一次浪潮都对前一次浪潮有所完善,而其表达的基本观点也在前面的浪潮中有所提及。作为变异社会语言学从第一次浪潮到第三次浪潮发展过程的研究课题,风格研究对每一次浪潮中涌现出的新观点都有所推动,同时也从这些新观点中获得深入发展的养分。

### 2.1 第一次浪潮的风格研究

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拉波夫的语言变异研究。在他著名的纽约百货商场研究案例中,拉波夫获取语料的方式是在商场中随意向顾客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女鞋在哪?”得到回答“在四楼”之后,他继续问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在哪?”这时他会再得到一个回答“四楼”(fourth floor)。虽然这两个回答都是“四楼”,但是第一个是以“随意”(casual)的方式回答,第二个是以“留意”(careful)的方式回答。这里“随意”和“留意”的说话方式就构成了拉波夫所观察的“风格”,具体体现在/r/这个音位变项的不同变体之中,如拉波夫在三个商场的调查数据所示,留意风格的/r/变体数量都明显低于随意风格的/r/变体数量(Labov 1997: 175)。在另一个案例研究中,拉波夫(Labov 1972)特别观察了纽约市下东区五个音位变项在不同语境中呈现的变异情况。这五个音位变项是/r/、/eh/、/oh/、/th/和/dh/,它们分别在随意、留意、朗读、词表、最小对立体等语境中呈现不同的音位变体,其中一些是具有声望风格的音位变体。在这个案例研究中,“风格”对于寻找语言变异的规律更为重要,被拉波夫认为是与阶层和年龄同等重要的控制语言变异的社会因素(田海龙、赵芃 2021: 59-60)。英国变异语言学家特鲁吉尔同样根据风格变异来探究英国诺里奇地区社会阶层的区别,他将劳工阶层再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将中产阶级再分为中、下两个层级,分别观察来自这五个阶层的受试在词表、段落朗读、正式讲话、随意讲话四种风格语境中发/ng/音的变异情况,发现所有受试/ng/的风格变异指数都是在随意风格的语境时较高,在词表风格的语境时较低,数值呈现出从随意风格向词表风格逐步下降的态势(Trudgill 1997: 181)。

拉波夫和特鲁吉尔关于语言风格的研究体现出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一次浪潮中风格研究的一些特点。例如,他们将风格变异视为发音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特定音位变项(variable)的不同变体(variant)之中。他们将语言风格与语言变异联系起来,开创了风格研究的新路径,但是,他们视风格为静态不变的语境,并称其为语境风格(contextual styles)(Labov 1966; Trudgill 1997: 180),认为风格是音位变体的直接控制因素,由说者注意力投入程度所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早期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的局限性。

## 2.2 第二次浪潮的风格研究

突破拉波夫式风格研究局限的是贾尔斯和鲍斯兰 (Giles & Powersland 1975) 提出的“适应论” (accommodation theory) 和贝尔 (Bell 1984) 提出的“听众设计” (audience design) 理论。这两种理论将言说者在交际过程中的能动性 (agency) 引入风格研究, 认为言说者的语言风格是其在主动适应交际需要的过程中形成的, 而不是在交际语境直接控制下产生的。例如, 贝尔 (Bell 1997) 对新西兰电台播音员的播音风格进行研究, 发现播报相同内容时会因听众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播音风格。他所关注的音位变项是 /t/, 观察的两个广播电台分别属于“国家电台”和“地方电台”, 分别标注为 YA 和 ZB, 前者的听众比后者的听众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研究发现, 单个播音员在这两个电台的播音表现出很明显的风格转换 (style shift) 能力。对播音员来说, 新闻主体相同, 播音间相同, 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投入的注意力不同。所以, 贝尔 (Bell 1997: 242) 提出“风格的转换主要是由于言说者考虑到听众的变化, 而不是由于他所投入的注意力多少所致”。

贾尔斯和鲍斯兰提出的“适应论”和贝尔提出的“听众设计”理论, 不再将语言风格定义为言说者对言说内容的注意程度, 同时也不再强调语言风格的静态特征, 不再认为语言变体与这一变体所体现的语言风格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一一对应的直接关系。相反, 这两种理论凸显了语言风格是言说者为了适应听者而选择的一种言说方式, 如此认识语言风格的特征与变异社会语言学发展到第二次浪潮有一定的关系。这一阶段的变异研究, 如米尔罗伊 (Milroy 1980) 对贝尔法斯特工人团体土语发音与他们所处社会网络之间关系的研究, 以及艾克特 (Eckert 1989) 关于底特律贝尔顿中学学生的语言变体与其谈论话题之间关系的研究, 都将“能动性”的概念引入变异研究, 而“适应论”和“听众设计”理论在风格研究方面也将言说者的能动性凸显出来。

## 2.3 第三次浪潮的风格研究

进入 21 世纪, 社会语言学体现出注重理论建构的特征 (田海龙、赵芃 2021), 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的研究亦是如此。沿着变异研究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方向, 变异社会语言学进一步发展至第三次浪潮阶段, 在理论上提出很多新的主张。例如, 不再坚持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共现关系, 而认为二者之间是通过说者能动性调节的间接关系; 不再注重探究语言变体在宏观社会范畴上的分布, 而是注重探究语言变体与个体及特定情景的互动; 不再强调语言变体对社会范畴的反映作用, 而是强调语言变体对特定社会范畴的建构功能。在这种研究范式的指导下, 变异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研究进一步深入, 不仅关注风格的语言学体现, 而且借助一些工具性概念, 探究语言变异所构建的言说者身份以及与该身份联系在一起的风格实践, 更加关注风格产生的过程 (例如 Eckert & Rickford 2001; Coupland 2007)。具体来讲, 这一阶段的风格研究在理论上关注语言风格对社会身份的建构作用, 注重阐释语言风格形成的机制, 在方法上提出一些可行的分析风格实践的框架和方法以及可以借助的工具性概念。这些体现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风格研究新特点聚焦在“风格实践”这一语言风格的社会实践特征上面。

### 三、风格实践:风格的产生与阐释

“风格实践”(stylistic practice)的概念凸显变异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言说者通过选择使用特定语言变体形成风格的社会实践过程。这方面的研究既涉及风格的产生,又涉及对风格的阐释(Eckert 2018: 147)。就前者而言,第三次浪潮的风格实践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概念,如风格模仿、越界、风格化、拼凑、立场,说明言说者如何通过选择使用某一语言变体形成一定的语言风格,进而构建出特定的社会身份。就后者而言,第三次浪潮的风格实践研究提出一系列理论主张,不仅阐释言说者为什么可以借助某些特定语言变体形成某种特定的语言风格,而且阐释某种语言风格如何被听者认定为是这样一种风格。

#### 3.1 风格的产生

“风格”的一个传统定义是:风格是表达同一个内容的不同表达方式。然而,“风格实践”的概念则表明,风格不再是与内容分离的表达形式,而是与内容融为一体,从所表达的内容中产生,既与言说者的身份合一,又与言说者的立场同步。正如艾克特(Eckert 2018: 146)指出的那样:“不同的言说方式被用来表明身份的不同存在方式,而这些方式就包括了潜在的要表达的不同内容。”因此,风格实践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研究个体的语言风格,并将个体的语言风格与其身份建构联系起来。

例如,艾克特(Eckert 1989)注意到,在美国底特律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有的学生课后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有的则放学后在街头玩耍,这些属于不同“实践共同体”的学生使用的语言变体也不尽相同,前者更倾向于使用标准的英语变体,后者更倾向于使用非标准的、地方特征明显的语言变体。这些学生通过选择使用特定的语言变体,与特定的服饰和行为方式一起创造性地设计出与其他同学有别的风格,主动标明自己的群体身份,表明自己属于哪个有着共同课外活动兴趣、共同话题的“实践共同体”。这些学生的风格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风格模仿”(styling)的特征,即通过选择特定的语言变体“模仿”特定群体的语言风格,以便和他们认同的群体相似,或者通过选择其他语言变体与他们不认同的群体划清界限(Le Page & Taboouret-Keller 1985)。

“风格模仿”是风格实践的一种方式,与之相关的另外一种风格实践的方式是“越界”(crossing),指言说者选择使用与其身份或所属群体不符的语言变体,如伦敦的白人母语者使用亚裔英语的现象(Rampton 2005)。通过“越界”这种风格实践,言说者往往借助外族或其他群体的语言特征来构建自身的新身份,而这种身份往往是一个明显不属于自己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越界”这个概念被置于风格变异研究的建构主义中心位置(Coupland 2007: 138)。与此类似,“风格化”(stylization)这一概念也被用来研究言说者如何使用某种语言变体来构建身份。“风格模仿”和“风格化”都是表达立场的一种形式(Jaffe 2009),只不过“风格化”更加强言说者通过挪用强者的语言变体(如被认为具有某种风格的变体)来反抗霸权和挑战垄断话语,并使这种变体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如构建一种新的身份)(参见 Coupland 2007: 150)。例如,在伦敦的一个多民族俱乐部中,白人学生有意学说亚洲英语的语音语调。这种语音语调不是地道的英语,被认为具有过度强调语言形式的风格特征,这些白人学生故意操演这样“风格化”的活动,就是要建构一种虚假的身份,与自己更加习惯的言说风格对抗(Rampton

2005)。“风格化”的操演在无线电广播这样的“高操演”的“身份活动”(act of identity)中应用,可以使播音员通过选择某种风格的播音方式与其机构和媒体的要求更加适应,而其中所建构的个体身份并非是其真实的身份(Coupland 2007: 150)。

在言说者的风格实践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语言变体,包括被认为具有特定风格的语言变体,都成为言说者可以挪用(appropriate)的语言资源。就风格的产生而言,需要注意的是,一种风格的产生不仅仅是单一语言资源被挪用的结果,多数情况下是不同语言资源被整合(combine)和拼凑(bricolage)在一起再使用的结果。张青(Zhang 2005)在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白领女性员工的创新性语言风格时就注意到,她们时髦、国际范儿、区别于国企员工的语言风格就是通过将多种语言资源拼凑在一起建构出来的,这些语言资源包括音位变项和词汇变项,前者如轻声发重音、去儿化音,后者包括中文中夹杂英文单词。

风格的产生不仅是多种语言资源拼凑使用的结果,就个体的语言风格而言,也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说者的“立场”(stance)成为一个观察的维度。所谓“立场”,简而概之,就是言说者对自己与自己所谈内容以及自己与听者之间关系的语言表述(Kiesling 2009: 172)。在风格实践过程中,言说者不断重复使用自己表达立场的语言资源,不断重复自己在与听者关系、与所谈之事关系中的定位,便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例如,约翰斯通(Johnstone 2009)注意到美国黑人女政治家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 1936—1996)在演讲时常常使用“我认为”(I think)之类的明示标记和“那或许是真的,或许不是”(that may or may not be true)之类的模糊标记;除此之外,乔丹还坚持使用语法规范的标准书面语,经常选用正式且考究的词汇、复杂句式以及新词。约翰斯通发现,乔丹借助这些语言资源凸显出自己正式、精确、考究的态度,与听众保持距离的立场,以及对自己观点的确信无疑。经常使用这些表达自己观点和态度的语言形式,久而久之,她演讲的语言特征日趋明显,最终形成了她的演讲风格,让人感觉到她的深刻、博学、智慧和坚持。就这个案例而言,芭芭拉·乔丹具有特点的演讲风格即是在表达立场的语言形式不断重复进而形成一套稳定的社会实践模式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重复的立场表达方式可以形成与特定个体相关的风格”(Johnstone 2009: 29)。

综上,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实践”的研究在探究风格如何产生和形成过程中,认识到风格的产生是言说者选择使用特定语言变体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风格模仿、越界和风格化等不同的风格实践方式。这些风格实践方式凸显了风格实践对言说者个体身份的建构作用,因此风格实践与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社会语言学的身份研究越来越成为对风格的研究”(Bucholtz 2009: 146)。除此之外,变异社会语言学还认为言说者风格的形成与语言资源的拼凑与组合、立场表达的不断重复相关。这些观点都更新了传统的关于风格的认识。

### 3.2 风格的解读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关于“风格实践”的研究蕴含了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的解读与阐释,但是,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的阐释更明显地体现在研究风格实践的具体分析框架上面。这个分析框架由四个彼此关联的分析步骤组成(田海龙、赵芃 2021: 208-209),综合应用于案例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地阐释风格实践的产生及其影响语言景观的机制。依据这个框架,研究的第一步要根据研究目的确定语言变项及其相应的语言变体。这些变项和变体可以是词汇句

法层面的,也可以是音位层面的,一般具有和标准语偏离的特征。第二步要确定与这些语言变项和变体相关联的社会变项,即这些变项体现出什么潜在的语言风格。第三步要解释语言变体对言说者新的社会身份的建构机制。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说者及其群体的意识形态观念,如使用这种语言变体是否被认可和接受,是否被模仿,以及它所建构的新身份在社会和语言景观中的地位如何等等。第四步是阐释风格实践的意识形态力量,即在第三步分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释语言变项或变体作为风格创新对引发社会变化的作用。分析的内容包括对新的语言风格的认可程度、对新的语言风格和与之相对的旧的语言风格的不同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评价中心的形成及其相互斗争。通过第四步的分析可以阐明语言创新通过意识形态力量如何引发社会变革。

这个分析框架将张青(Zhang 2018)提出的“基于风格的社会语言学演变研究路径”具体化为四个分析步骤,为风格实践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依此分析框架,田海龙、赵芃(2021: 209-213)重新阐释了张青(2010)对两位女主持人在一个购物节目中创新性使用语言变体建构时髦身份、前卫风格,进而引领消费的研究,表明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为清晰地认识言说者为什么可以借助某些特定语言变体形成某种特定的语言风格。在这个分析框架的第三步,需要解释语言变体为什么可以建构出言说者新的风格和身份,这实际上阐释了听者如何将某种语言风格认定为是这样一种风格。这就需要借助一些概念性工具(conceptual tools)。

指向性(indexicality)和与之相关的指向秩序(indexical order)是用来阐释风格实践的两个概念。在皮尔斯的符号学论述中,一个指向符(index)之所以可以指向它的对象,与之建立起指向关系,是因为“它与那些把它当作符号的人的感觉或记忆有联系”(皮尔斯 2014: 56)。基于皮尔斯符号学,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用“指向性”(indexicality)表明一个特定的语言变体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那个现实社会中的情景,如港台人特定的发音方式(如把“学生”的“生”发成重音)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港台地区或经常使用这种变体的港台人。西尔弗斯坦把这种语言特征与其对象的指向关系称为“第一级指向关系”(first-order indexical correlation),标注为n-th。“第一级指向关系”表明语言特征“预设”出它被常规性使用的语境,但是这个语境具有某种图示化功能,使人们能够识别出这个语言特征在该语境中是否得体(Silverstein 2003: 193)。这种“图示化”(schematization)即是一种语言意识形态,暗含着对这个语言特征是否与之适合的认识,如在张青(Zhang 2005)的研究中,外企的白领女性在北京使用这种港台腔就会被认为“不合适”,或者被认为与北京当地人的发音形成明显的对照。在这种“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港台腔的语言变体就会被赋予社会意义,如这种轻音发重音的现象(如“学生”的港台腔)对外企白领女性群体来说就显得更为合适,而国企员工如果这样发音就显得不得体。这时,该语言特征与这个在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下产生的社会意义便形成一种新的指向关系,被称为“第二级指向关系”(second-order indexical correlation),标注为n+1-th。“第二级指向关系”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于该语言变体“第一级指向关系”的结果,是在“民族元语用驱动”(ethno-metapragmatically driven)下对该语言变体进行“本地解读”(native interpretation)的结果(Silverstein 2003: 212)。在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港台腔的发音特征就可以成为一种风格,如果要前卫就要说港台腔,而要保持地方特色就要避免说话带港台腔。当人们意识到港台腔的语言变体不仅指向港台地区和港台人(n-th),而且还形成一种“前卫”

的风格( $n+1$ -th)时,人们就可以在自己的言谈中使用这种港台腔语言变体以显示自己来自港台地区,或者借此创造一种“前卫”的风格。这种被实施的(performed)言谈风格也是一种指向意义,西尔弗斯坦称之为第三级指向关系(third-order indexical correlation),标注为( $n+1$ )+1-th,在这里指使用该变体的意愿与听起来像港台腔的言谈之间的联系。

借助“指向性”概念阐释风格实践可以认识到,特定的语言变体之所以形成特定的风格,并非该语言变体自身的作用,而是该语言变体被认为具有某种风格。在上面的案例中,外企白领女性的港台腔之所以体现前卫的风格,即是这一港台腔受到“民族元语用驱动”的“本地解读”。在这个意义上,厄文(Irvine 2001)认为风格具有独特性,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语言意识形态对“有别于其他语言表达方式”的语言变体进行理解,进而识别这种被视为具有独特性的风格。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戈尔和厄文(Gal and Irvine 2019)提出“呈符化”的概念,强调一种指向关系之所以又成为象似关系,进而一个符号可以被语言使用者认为与某种特性具有象似性,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完全是因为“语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结果(赵芃、田海龙 2022)。

“呈符化”也是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的一个概念。皮尔斯依据解释项再现符号的方式把符号分为呈符(rheme)、申符(dicent)和论符(argument)(Parmentier 1994: 17)。当一个符号与一个物体具有“指向关系”之后,这个“指向符”如果再被“猜想”(conjecture)与另一个物体具有“象似关系”,那么这个符号就被称为“呈符”。例如,考尔德(Calder 2018)注意到,旧金山的一群变装皇后发英语/s/音时部位靠前,像汽笛那样尖利。当人们听到这种发音时,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将这种发音与这些人联系起来,建立起“指向关系”。这些人凶狠、严厉、锋芒毕露,当这些“抽象品质”习惯性地与语言形式相关联,并与使用这种语言形式的角色连在一起时,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尖利地发/s/声音)也可以被感知,形成“感知特性”(qualia),使这种尖锐的物理声音与严厉的人格建立起“象似关系”。再如,北京话里有一个称作“儿化音”的地方变体,如把“名牌”说成“名牌儿”。“儿化音”这种发音在老舍小说关于北京人的描述中,经常是被称作“京油子”的一类人的语言特征(Zhang 2008, 2018),因此“儿化音”这种语音变体与“京油子”及其存在的地域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指向关系”。当这种指向关系转变为“象似关系”时,如“儿化音”这种发音变体与“京油子”这类人“油滑”的特性建立起“象似关系”时,则完全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京油子”待人处事的“油滑”逐步成为“刻板印象”,以至于“京油子”发“儿化音”的方式与他们“油滑”的处事方式在“刻板印象”这类“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建立起“象似关系”。这个研究案例表明,“儿化音”这个语言变体作为“指向符”(index)可以指向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京油子”,这种指向关系在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又可以转变为“儿化音”与“京油子”的“油滑”这一抽象品质之间的象似关系。正是人们将“京油子”发“儿化音”的语言特征与“京油子”所具有的“油滑”特性联系在一起,赋予了“儿化音”以“油滑”的象似性,使得说“儿化音”的人在听者看来具有了“油滑”的风格。

#### 四、与修辞学风格研究的互鉴

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三次浪潮中的风格研究聚焦风格实践,不仅认为言说者通过风格模仿、越界、风格化、拼凑等不同方式实施风格实践,而且提出阐释风格实践的分析框架,并借助立场、指向性、呈符化、语言意识形态等概念阐释风格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探究风格实践的过程

中,风格不再被认为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达方式,而是建构身份、表达立场的社会实践。这种对风格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与修辞学关于风格的认识相得益彰,例如,祝克懿(2021)从语言风格研究的理论渊源与功能衍化视角梳理修辞学领域关于风格的相关认识,认为风格的概念集中在五个方面:1)风格即人,2)风格即作品,3)风格是一种言语活动,4)风格是一种功能意义/语体色彩意义/特征/差别/着重,5)风格是对标准的偏离。如果以此为参照,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的认识也可以总结为五点:1)风格与身份相关,2)风格体现在语言运用当中,3)风格是一种社会实践,4)风格体现社会意义,5)风格是使用语言变体的结果。可见,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修辞学对风格的总体认识具有共同之处。

然而,由于研究传统的差异和研究侧重的不同,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修辞学就风格研究而言各自具有各自的特点,这也构成了彼此相互借鉴的基础。通过相互借鉴,可以共同深入关于语言风格的认识,进而拓宽各自的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路径。

一方面,修辞学领域关于风格本身为何物的讨论为变异社会语言学认识风格的体现形式提供了借鉴,在修辞学关于“语言风格”的讨论中,“风格”与“修辞”的联系与区别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对此,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修辞为主,风格为副;修辞为里,风格为表;修辞为因,风格为果。然而,赵毅衡(2018)对这种认为“风格”与“修辞”是因果关系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风格比修辞的范围大很多,其变化的可能性也比修辞多得多。他认识到“修辞格”有一个系列,风格却更难总结成一个系列,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风格是符号文本的附加符码,而修辞是符号文本本身的构成符码”(赵毅衡 2018: 296)。这里,他引入符号文本的概念,将“风格”与“修辞”的联系与区别借助符号文本体现出来,为修辞学进一步认识语言风格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风格”毕竟是一个内容涵盖非常宽泛的概念,不仅玄乎虚渺,而且飘忽不定。但是,就其字面意思而言,祝克懿(2021)的解释很具有概括性,她认为:“风”者,即动也,流则生气,动则成风。表现形态为一种流动、传动、浮动、移动、舞动、飘动、摆动、飞动;而“格”者,即传统的、既有的、配套的、成型的、成熟的、唯美的格式(模式、范式、定式、板式、类型、面貌、整体、合体等)。若“风”“格”概念意义合为一体、兼而达意,则表现为一种动与静、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尊崇“风”,创新可成就其风格;恪守“格”,协同无数个体,整合则形成整体格调和气氛。基于此,祝克懿(2021)进一步指出,语言学意义上的“风格”指语言运用所形成的整体格调和言语气氛,它反映的不是语音、词汇、语法单位自身的结构、语义发生发展规律,而是这些语言单位在运用过程中,由语言内外制约因素系统形成的各种风格形态、风格表征、风格结构类型及风格语义的历史演变规律等。因此,风格的考察范围与方式不重语言的规范性、整体性、普遍性,而重语言的变异性、个体性、特殊性。“风格”“发展、变化、平衡,再发展、再变化、再平衡,以至无穷”,生成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体现出“风格”涵义的“关键、机杼、要点和核心”。

从祝克懿关于风格的概括性论述中,可以看到风格在修辞学的研究中被认为是语言的变异性与制约这种变异性的内外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整体格调,这种风格的“个体-整体”辩证观对修辞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篇章风格的研究方面,刘婉晴(2021)提出“风格互文”的概念,认为语言风格是语篇整体风貌的综合呈现;黄鸿辉、祝克懿(2022)对笔记小说经典文本的体裁风格进行分析,提出一个体裁风格的分析程序和互文生成路径,认为体裁风格具有语篇结构整体性与语义流动性,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在体裁嬗变过程中呈现的整体格调和言语气氛。这些基于风格现代解读的成果,也传承了陈望道(1932/1997)、高名凯



(1960)等前辈关于风格的经典论述。以此为参照,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的认识在析辨体现风格的语言形式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变异社会语言学在研究风格实践的基础上触及风格对身份的建构,以及立场对个体语言风格形成的作用,如此认识风格也预设出风格需要体现在特定的语言形式上。目前的研究已经涉及到音位变体、词汇变体,对音调也有所涉及,但是在篇章层面体现风格的语言形式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在这个意义上,变异社会语言学可以借鉴修辞学关于风格的认识,进一步拓展认识风格的视角,深化关于风格与体现风格的语言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另一方面,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实践的认识也为修辞学深入探究风格的建构性特征提供了借鉴。如本文的讨论所呈现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三次浪潮中关于风格实践的研究凸显了语言的建构性,因而也更加强调风格的社会实践特征。与此同时,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语言变体对言说者社会身份建构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以及研究发现的个体性和特殊性,都体现出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对现代主义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判,特别是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三次浪潮中的风格研究将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置于中心位置,借助“指向性”和“指向秩序”的概念阐释风格产生的机制和过程,将风格实践研究推向了一个理论高度。在这方面,赵星植、彭佳(2018)从皮尔斯能量解释项的角度阐释风格的形成,认为风格是符号文本对解释项所产生的实际效力,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文本、动力对象与文本解释项之间的具体关联方式,需要调动解释项在符号过程外部与周围的诸种间接经验,从一个角度回应了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关切。这也展示出变异社会语言学与修辞学(包括符号学)在风格研究上相互借鉴的广阔前景,显示出不同学科通过相互借鉴彼此的研究成果在拓宽研究视野、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方面的潜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点认识仅是作者学习过程中的思考而已。关于修辞学与变异社会语言学在风格研究方面相互借鉴的讨论也涉及中西方研究传统的相互借鉴,这是一个内容庞杂的研究领域,非作者目前的知识储备所能胜任。

## 五、结 语

本文关于风格研究的讨论呈现出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认识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变异研究的第三次浪潮中,风格的社会实践特征被置于风格研究的中心位置。围绕风格实践的研究,变异社会语言学涌现出许多新的理论和概念,对风格的产生方式和机制都有了新的认识。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的新成果顺应了社会语言学注重探究语言社会实践属性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风格研究也提供了借鉴。我国的修辞学在风格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研究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在不同学科的相互借鉴中也产生出新的研究成果。相信社会语言学和修辞学在风格研究方面的相互借鉴将进一步推动中西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 参考文献

- 陈望道 1932/1997 《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高名凯 1960 语言风格学的内容与任务,《语言学论丛》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鸿辉、祝克懿 2022 体裁风格分析程序及互文生成路径——以笔记小说经典文本的体裁风格为例,《当代修辞学》第1期。

- 刘婉晴 2021 “风格互文”现象的描写解释与特征识别,《当代修辞学》第1期。
- [美]皮尔斯 2014 《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
- 田海龙、赵 芃 2021 《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 张 青 2010 “将购物进行到底!”——中国电视媒体中的语言创新与社会区隔,田海龙、徐涛主编《语篇研究的庐山真面》,南开大学出版社。
- 赵 芃、田海龙 2022 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梳理、角色界定、理论思考,《外国语》第4期。
- 赵星植、彭 佳 论风格与情感、修辞之关系——一个皮尔斯解释项三分路径,《学术界》第1期。
- 赵毅衡 2018 《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 祝克懿 2021 语言风格研究的理论渊源与功能衍化路径,《当代修辞学》第1期。
- Bell, Allan 1984 Language style as audience design. *Language in Society*, 13(2), 145-204.
- Bell, Allan 1997 Language style as audience design. In Nickolas Coupland & Adam Jaworski (eds.).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 London: Macmillan ST. Martin's Press, 240-250.
- Bucholtz, Mary 2009 From stance to style: Gender, interaction, and indexicality in Mexican immigrant youth slang. In Alexandra Jaffe (ed.). *Stanc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6-170.
- Calder, Jeremy 2018 The fierceness of fronted /s/: Linguistic rhematization through visual transform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1-34. Doi: 10.1017/S004740451800115X.
- Coupland, Nikolas 2007 *Style: Language Variation and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ckert, Penelope 1989 *Jocks and Burnouts: Social Categories and Identities in the High School*. New York: Teach. Coll. Press.
- Eckert, Penelope. 2012 Three waves of variation study: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vari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87-100.
- Eckert, Penelope 2018 *Meaning and Linguistic Variation: The Third Wave in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ckert, Penelope & Rickford, John (eds.). 2001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l, Susan & Irvine, Judith 2019 *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es, Howard & Powersland, Peter 1975 A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 of speech diversity. In Howard Giles and Peter Powersland (eds.). *Speech Style and Social Evalu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54-170.
- Irvine, Judith 2001 “Style” as distinctiveness: The culture and ideology of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In Penelope Ecker and John R. Rickford (eds.).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43.
- Jaffe, Alexandra 2009 Introduction. In Alexandra Jaffe (ed.). *Stanc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8.
- Johnstone, Barbara 2009 Stance, style, and the linguistic individual. In Alexandra Jaffe (ed.). *Stanc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52.
- Kiesling, Scott 2009 Style as stance: Can stance be the primary explanation for patterns of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In Alexandra Jaffe (ed.). *Stanc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1-194.
-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bov, William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bov, William 1997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 in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store. In Nickolas Coupland & Adam Jaworski (eds.).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 London: Macmillan ST. Martin's Press, 168-178.
- Le Page, Robert B. & Tabouret-Keller, Andree 1985 *Acts of Identity: Creol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Ethni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hin, David & van Leeuwen, Theo 2005 Language style and life-style: The case of a global magazin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7(4), 577-600.
- Milroy, Lesley 1980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Oxford: Blackwell.
- Parmentier, Richard 1994 *Sings in Societ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Rampton, Ben 2005 *Crossing: Language and Ethnicity Among Adolescents* (second edi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 Silverstein, Michael 2003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3, 193-229.
- Trudgill, Peter 1997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In Nickolas Coupland & Adam Jaworski (eds.).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 London: Macmillan ST. Martin's Press, 179-184.
- Zhang, Qing 2005 A Chinese yuppie in Beijing: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rofessional identity. *Language in Society*, 34, 431-466.
- Zhang, Qing 2008 Rhotacization and the "Beijing smooth operator": The social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variabl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 201-222.
- Zhang, Qing 2018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ing Commonness through Cosmopolitan Mandarin*. London: Routledge.

## The Study of Style in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and Mutual Learning with Rhetoric

Tian Hailong

**Abstract:** With the move of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from the first Wave to the third, the study of style advances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accordingly, on the first of which style is considered as result of the speakers' attention. Then style is viewed as caused from the design for audience, and now style is taken as the stylistic pract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eakers' identity. This article takes stylistic practice as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in terms of style produc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is process of producti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style, concepts such as styling, crossing, stylization, and bricolage are discussed, and for explanation of style production process concepts like indexicality, rhematization and ideology are discussed. In so doing, the article highlights new theories of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of style, on the basis of which, also based on a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rhetoric study of style, the article proposes two aspects where mutual learning is necessary for both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and rhetoric in the study of style.

**Keywords:** style, stylistic practice,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rhetoric, mutual learning